

# 物质的时空旅行

——云南高原坝子葡萄的前世今生

郑向春

[摘要] 以来自高原坝子的葡萄作为人类学视域中的物,通过坝子里的人及其历史表述,探讨历史真实、话语权力、符号性消费的问题。在以葡萄为媒介的人、地、历史、符号等要素互动过程中,探讨对坝子里与坝子外社会的变动与影响。

[关键词] 物;葡萄;历史表述;话语权力;符号性消费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JZ01-0041-04

## 一、回归“物的民族志”

近

年来,对于民族志中物的研究兴趣与关注,反映了人类学界历来对自己学科的批评意识和反思态度。学者们重又拾掇起物,讨论它们、思索它们,表明这样一种诉求:试图在对物的重新发现与关注中,来诠释那些以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凭附于物之上的历史价值、象征意义与社会指喻。彭兆荣在《遗事物语——物的民族志》一文中,详细梳理和分析了民族志中的物,强调了民族志由于重视对物的观察和研究而形成了“物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of object)范式。<sup>[1]</sup>黄应贵的《物与物质文化》<sup>[2]</sup>沿着四种不同的探讨路径:物自身、物的交换、物的象征及物的心性,研究与探讨民族志中物的性质。孟悦在《什么是物及其文化》<sup>[3]</sup>一文中区分和讨论了物与交换流通,物与帝国、殖民,物与技术,物与物象、意识形态、时间等关于物的研究种种范式。巴巴拉(Barbara, K. G)在《目的地文化》(Destination Culture)<sup>[4]</sup>一书中,强调了“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正是民族志对物的研究”(that ethnographic objects are objects of ethnography)。<sup>[4](P2)</sup>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总是包含着制作的成分,由于人类学者们对物的定义、制造、分离与搬移,使物原本的意义起源同最终的意义落脚处相互分离。由梯利(Tilley, C)和科那(Keane, W)等人主编的《物质文化手册》(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sup>[5]</sup>一书,不仅详尽梳理了人类学各理论流派对于物的研究,而且从主观与客观、过程与转变、政治与表述、身体与感觉等视角来探讨物及其文化。

其实,物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和学理依据。进化论者将物视为已逝社会的“残存”(survival),以此作为构筑社会演进图示的证据与标志;播化论者将散落于不同区域却又相似的物质形态作为证据,想要描绘出一副人类文化的分布图;功能论者依据人们对于物的需要、制作与使用,试图构建出一种普同的文化科学范式;结构主义者,通过研究社会中物的表现与交换,探索隐匿于物之下的思维

结构;象征主义者将物作为意义之网中的交流媒介,以此来探讨社会价值观与文化象征意涵。

然而,不论物处于上述那个理论学派,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中,物都交织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网络中。这一理念可以追溯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人与物并非单纯的二元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与动态的关系。<sup>[6]</sup>一方面,无论是作为自然的物(一块石头、一只动物和一颗植物),或是人类的物化手段、过程或结果,物本身具有客观性与实在性;另一方面,物的客观性又同人的认知、观念、记忆、想象、象征等主观因素,甚至是人的生活本身密切的交织与纠葛在一起。

## 二、葡萄作为民族志的物

本文的主角葡萄,来自于云南高原坝子——南乡坝。南乡坝地处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州弥勒县境内,与传统农村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不同,坝子以葡萄种植作为主导,坝子里的葡萄种植面积有15000亩,不仅是云南省的葡萄主产地,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葡萄种植基地。伴随葡萄丰产的是坝子里红红火火的葡萄酒酿造工业、名目繁多的葡萄酒牌子、大大小小的葡萄酒酒庄,“云南红”、“印象”、“米轨时光”、“神泉”、“东风庄园”、“宝云”等都是来自坝子里的葡萄酒品牌。

葡萄在坝子里扎下根,结出果,而且成长得枝繁叶茂,同坝子的生态环境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葡萄的生长条件非常挑剔,尤其是用作酿制酒的葡萄。葡萄种植地的海拔、日照时数、土壤、降雨、风向、气温、湿度等无可比拟的气候及自然条件,是酿造优质葡萄酒的前提要素,同时,对于所酿葡萄酒的风味及口感至关重要。虽然环境并不能作为解释物的选择及其文化的唯一要素,但是自然生态条件确实是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关键。在物的民族志书写中,自然的生态环境同物的选择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努尔人》<sup>[7]</sup>中介绍分析了生活在尼罗河畔的努尔

人  
类  
学

郑向春 / 物质的时空旅行

人由于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得不以牧养牛群的游牧生活为主,他们每年都随季节变换赶着牛群往返迁徙于高地与草地之间,牛的营养与数量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形成了努尔人群特殊的以牛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弗思(Firth, R)在《人文类型》一书中,分析了环境与人类社会类型之间的关系,环境一方面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物质,根据人们能在环境中获得食物的方法,弗思将人类社会分为渔业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艺社会四种类型。<sup>[8]</sup>斯图尔德(Steward, J)指出环境与文化辩证式的因果关系,分析了北美大盆地肖肖尼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群体社会之间的互动,由于食物资源的极度分散,造成了肖肖尼人流动性和缺乏领导的松散社会单位,强调了自然环境对文化的选择性和限制性。<sup>[9]</sup>马文·哈里斯(Harris, M)分析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猪肉的禁忌,实际是生态环境限制下,一种对成本和收益估算后的选择。适于生活在森林、河畔与沼泽边缘的猪,不适合中东的高温和阳光,而且猪不能靠食草而赖以食粮,成了与人争食的动物,另外要为猪提供人工棚圈和潮湿条件又增加了成本,最终,高昂的代价和对环境的不适应,形成了古代以色列人对食猪和养猪的神圣禁令。<sup>[10]</sup>

总之,在传统的社会生活形态中,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对于动物饲养、植物栽种、或是人类生活而言,即提供了基础又进行了限制。一方面,自然环境提供了某种植物生长的特定条件,如气候、湿气、土壤、阳光;另一方面,植物种植的特点与价值,以及人们围绕于它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又会形成地方族群关于此物的特别文化。同样的,葡萄要想在一个地方落下脚、扎下根,也有其严格的自然条件限定,一般来说,葡萄的生长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充足的阳光、温暖且干爽的气候、适量的雨水、较大的日夜温差、透气的砂石土壤、对于病虫害的抑制。南乡坝奇迹般地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为葡萄的栽种奠定了必不可少的自然基础。而围绕葡萄丰收形成的大规模葡萄酒的生产,又形成了坝子里不同于传统农村依靠粮食的生计模式和经济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坝子里的葡萄能够如此大面积的栽种,同葡萄的历史根源紧密关联。

### 三、葡萄的前世:坝子里的 法国殖民遗物

南乡坝的葡萄与法国的殖民历史相关联。起始于15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核心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吉登斯(Giddens)则将其作为标志与前现代社会断裂的一种现代性的社会联系方式。然而,无论这种经济殖民被如何定义,实质都是一种同以往社会关系截然不同的断裂与转变,而伴随其中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征服、控制与掠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最大限度上获取商业经济利益而对其他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实施侵占与控制,以寻找原料、商

品、劳务、市场等经济要素。

法国人的葡萄种子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殖民的情景之下,被带入云南的。云南一直是西方各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垂涎之地,云南的地理、气候、尤其是丰富的矿藏,都让各国跃跃欲试想要将其裹入囊中。1789年大革命之后便在资本主义大道上迅速奔跑的法国,自然不会落后于他国,法国人以传教士、探险家及商人的先期探查作为其实施殖民计划与行动的风向标。从19世纪开始,法国的传教士便陆续进入云南腹地进行侦查与勘探,足迹遍及极为偏远的雪山峡谷之中。他们于所到之处建盖教堂,为了能与当地人和谐相处,免费为当地人看病、建学校,当然教当地人种葡萄、酿制葡萄酒也就包括其中。由于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作为教堂举行弥撒的圣物,葡萄酒对于法国人的生活至关重要,他们总是在自然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教堂的院子里种植葡萄供酿酒之用。云南北边香格里拉的茨中村,是为数极少的能满足葡萄生长条件的雪山峡谷,法国人在茨中教堂后20来平方米的院子里种植着他们自己从法国带来的葡萄种子。南乡坝的葡萄盛传便是从茨中教堂传播而来的。

身负国家殖民探查任务的传教士,在南乡坝被描述为充满梦想的法兰西传教士;法国传教士远赴偏僻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雪山峡谷进行地理条件、资源状况的勘查,在坝子里被形容为漂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的神赐之旅。此刻,正当人们热烈的探讨萨义德(Said, E)在《东方学》<sup>[11]</sup>(Orientalism)一书中所批判的对东方的“妖魔化”问题时,南乡坝的葡萄酒正试图向人们表述与营造对法兰西的浪漫与诗意想象。萨义德在书中批评了泛滥于媒体和公众头脑中的东方学观念,比如,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的、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sup>[11](P142)</sup>坝子里的葡萄酒历史,则将法国殖民主义者形象描述为:充满梦想的年轻的法兰西传教士孤身一人的神赐之旅,在历尽千辛万苦,漂洋过海之后,终于来到他梦中的香格里拉。

其实,无论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贬损化想象,还是东方对于西方异国情调的憧憬,确如萨义德所述,“东方”或是“西方”概念本身都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是在人为努力下构成的,而且这一虚构,在当代电视、电影、网络的媒体资源下,变得更加容易被人所操控。<sup>[11](P3,34)</sup>坝子里的人们极力地隐藏葡萄酒身世背后与殖民主义关联的丑陋与血腥,而努力地建构葡萄酒与法国作为浪漫的代名词与葡萄酒圣殿的关系,在坝子里关于葡萄的华美篇章与历史叙事中,传教士的政治任务被其宗教职能与神的光环所覆盖;法国的殖民罪恶被其一贯为人们所想象与认同的浪漫与情调所掩盖;茨中的教堂被村子本身的美丽与祥和,以及香格里拉中的梦幻美化与诗化。

至少,南乡坝关于葡萄的身世来源,以及这一身世中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的转变,引发了我们对如下问题的思索:其一,在人们的叙事中,历史的真实性应该如何定义?其二,能够操控与组织集体表述的话语权利来自于哪里?其

三,这种激发群体激情与想象的动力源自何处?

#### 四、葡萄酒历史中的诗性逻辑

源自 19 世纪的一段葡萄的历史故事,如今在坝子里扎下根,结出果,而且如葡萄藤一般向四周蔓延开来。葡萄随法兰西传教士的神赐之旅来到云南香格里拉隐没于雪山峡谷中的茨中村,随后散落在滇越铁路边的葡萄种子被坝子里的知识分子们发现,并带回坝子里栽种,留过法的老知识分子识别出它是早已在欧洲生态危机中绝迹的法国名品酿酒葡萄——玫瑰密(Rose Honey),于是早已在百年前灭迹的葡萄名种,如今却在偏远的高原坝子里生长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残酷的拓殖、法国人为了掠夺资源而修建的滇越铁路、被错处而从省城下放到坝子里的农学家,所组成的本应是一段充满无奈与伤悲的历史,可是在坝子里却幻化为一个充满诗意与传奇的历史故事,而且这段故事如今确实实实在南乡坝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在伴随葡萄种植 40 年的历史中,坝子里从最初以栽种水稻、玉米、小麦为主,到后来 6 亩地的葡萄种植,到今天葡萄 15 000 亩的栽种面积。以前干涸贫瘠的坝子被现今高原葡萄之乡所代替;往昔的稻穗被如今红红绿绿、晶莹剔透的颗颗葡萄所取代;以往充满委屈与悲伤的历史记忆被今天充满对东方波尔多的想象与憧憬所淡化。葡萄日益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当地人最为重要的生活同伴与经济来源。

其实,貌似真实的历史本身充满诸多的想象、记忆、观念与期待,而关键是,当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碰到现实的土壤时,二者间发生的化学作用会产生怎样的新意与新质。萨林斯(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sup>[12]</sup>一书中精巧地以夏威夷神话仪式与库克船长的历史传说为例,彻底打破了历史中虚拟与事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价值界限,超越了对简单真实的追求,而寻得了另外一种真实——“诗性逻辑”(poetic logic),历史在此一如神话,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它有一套规则:“夏威夷的历史经常重复叙述着自己,第一次它是神话,而第二次它却成了事实。”<sup>[12][13]</sup>若将英文单词 history 做一番趣味解法,也可发现其中构建性意味。一做 hi-story, hi-是“高”的前缀,是说历史总是一种高调的故事,一种声音大,内容虚的故事;<sup>[14]</sup>另一做 his-story,即他讲的故事,历史的讲述在这里本质就是故事的讲述。<sup>[13](P4)</sup>

不过在这段诗化了的历史背后,我们不能忽略它之所以能获得集体表述的力量——话语权力。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经典阐释,在他看来,话语形成的核心在于权力,正是权力对认知进行控制,由此对可以想和可以说的话进行着挑选,同时也对话语产生的威胁进行监督。<sup>[15]</sup>由此,在权力的操控下话语的特点表现为:一是话语的构建性。话语并非自然而就,它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规则驱使下成为某种构建的结果;二是话语的转换性。话语总是

游离于不同的情景与时代,以不同的方式来分布、分配和标志;三是话语的整合性。话语总是能将散落与不同时空的要件在一个特定层次上进行加工、整合,最终构成一个整体;四是话语的逆向因果性。话语总会根据想要的结果来组合要件,话语不仅和产生它的环境,同它引起的结果相关联,同时也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同它最后的表述向关联。同样的,坝子里葡萄酒的历史叙事,表现为构成它的话语与权力的一种关系性结果,地方政府的权力推导、国有农场的政策推动、经济实体的策略推广,再通过电视、广告、网络等媒体资源的强势推介,使坝子里关于葡萄酒的历史被构建出一番浪漫诗意的面貌;历史中的各个事件从殖民的情景中被转移出来,重置于坝子的葡萄酒历史中,赋予历史传奇色彩;同时用各种话语要素和修辞方式,对历史叙事进行润色与加工。最终,19 世纪的法兰西传教士、20 世纪初修建的滇越铁路、20 世纪中期来到坝子的老知识分子、百年前肆虐欧洲的生态危机、法国酿酒葡萄的名品“联袂出场”,一同为坝子里的葡萄谱写了一段传奇、梦幻般的历史,也共谋(complicity)了今天南乡坝的葡萄酒盛世。

#### 五、爱葡萄酒,还是爱故事?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可口可乐:来自特立尼达岛的黑甜饮料》<sup>[16]</sup>一文中,通过研究特立尼达岛人们对于可口可乐的消费情况,提出人们总爱挑选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饮品。喜爱异国情调,早已超出了人们对于饮品口感的喜爱,而将这种喜爱转化为了一种心理感受。

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积累了大量供给市场的消费商品,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个人从日益扩大的商品范围中购买商品,以最大限度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使消费成为了所有商品的目的。伴随着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商品消费与工具理性联系逐渐向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将商品消费同文化记号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人们的生活规律与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此改变投射在消费观念上的结果便是人们从过去单纯对物品使用价值的消费逐渐转化为对物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的消费,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对商品符号性质的消费,在鲍德里亚(Baudrillard, J)看来,今天用于消费的商品,在现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使用价值消失了,而成为了索绪尔意义上的符号,因此,消费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用用途的消费,而应看作是一种具有符号性质的消费。<sup>[17]</sup>莱斯(Less)以陈年佳酿的葡萄酒为例,认为它会赢得极高的声誉以及绝对的优越性,这意味着它从来没有被消费过(开过瓶、并被饮用),同时它又以不同的方式被象征性的消费着(被长久凝视、梦寐以求、品头论足、照相和拿在手里摆来弄去),使人获得极大满足。在这种意义上,表明了当代社会中的商品的两个象征层面:象征的手法不仅存在于生产和市场过程的设计与形象之中,而且,为强调生活方式对社会地位差异的区分,商品的象征属性也会被人们利用和重新调整。

这种符号性质的商品消费,与奇异、美、浪漫、奢侈、时

尚等各种社会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将消费的性质从实用转向文化,以满足不同群体或个人的不同需求。将历史文化注入南乡坝的葡萄酒当中,正是当代人们对于商品消费中文化品位的本质需求。坝子里的葡萄酒通过法国传教士、米轨铁路、法国酿酒葡萄名种,构建了同世界最好、最有名的葡萄酒出产大国——法国之间的渊源,增强了人们对于葡萄酒的认同;强调法国传教士作为葡萄种植的传播者、农场的老知识分子作为葡萄种的发现者、滇越铁路作为葡萄品种传至坝子的连接者,增强了葡萄在坝子里生根与成长的传奇性与独特性;法国葡萄酒的优良传统与法国酿酒葡萄名种在云南的劫后余生,通过各种媒体的渲染与宣传,向人们灌输了南乡坝葡萄酒所承载的厚重、珍贵、优质的品质。相应的,坝子里葡萄酒所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与兴趣。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七万左右的游客来到坝子,其中不乏欧美游客、东南亚游客,他们都期待品尝带有法兰西浓郁特色的高原坝子葡萄酒。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坝子旅游,使得坝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发现葡萄酒中的故事与符号的价值,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坝子中的人将葡萄与法国的渊源不断突现与诗化;另一方面,这种诗化了的历史与坝子坚实的土壤相结合之后,它们之间神奇的化学作用,使坝子里葡萄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同时葡萄酒酿造工业和旅游业也在坝子里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前世的一颗负载着残忍与无奈殖民历史的葡萄,在经过了世纪更迭与时空转换之后,在偏远的高原坝子里扎下根来,而且一改往日的潦倒,以浪漫诗意的面貌,同坝子的环境地理条件、坝子里的人一同创造了葡萄酒的神话与盛世。

### [参 考 文 献]

- [1] 彭兆荣. 遗事物语:物的民族志[Z]. 待发表.  
[2] 黄应贵. 物与物质文化[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2004.  
[3] 孟悦. 什么是物及其文化? [A]. 物质文化读本[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 Kirshenblatt - Gimblett, Barbara. (ed.):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5] Tilley, C, Keane, W, etc.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M]. Sage Publication, 2006.  
[6] Miller, D: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M]. Oxford: New York, 1987.  
[7] 埃文斯 - 普里查德, 著, 褚建芳, 译. 努尔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8] 弗思(Firth, R), 著, 费孝通, 译. 人文类型[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9] 斯图尔德(Steward J). The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10] 马文·哈里斯(Harris, M), 著, 张海洋, 王曼萍, 译. 文化唯物主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1] 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2] Sa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13] 彭兆荣. 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4] 王铭铭. 命与历史[A].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5] (德) 马克·克拉达, 等编, 朱毅, 译. 福柯的迷宫[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6]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可口可乐:来自特立尼达岛的黑甜饮料[A]. 孟悦, 罗钢. 物质文化读本[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7] 鲍德里亚(Baudrillard, J). 记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 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著, 刘精明, 译.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收稿日期 2009 - 02 - 10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韦光化]

[作者简介] 郑向春(1981~), 女, 云南昆明人, 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邮编:361005。